

但記正義卷

國子祭酒上

勅撰

# 中國古籍十二講

李致忠 芦婷婷 著



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不問  
距本

但記正義卷講

國子祭酒上二

勅撰 十

中國古籍

李致忠 芦婷婷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中国古籍十二讲 / 李致忠, 芦婷婷著. —北京: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8

ISBN 978-7-5596-0923-6

I. ①中… II. ①李…②芦… III. ①古籍研究

—中国 IV. ① G256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4855 号

中国古籍十二讲

---

责任编辑: 张永奇

整体设计: 李洪波

出版发行: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/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

邮 编: 100088

电 话: (010) 64256863

印 刷: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225 千字

印 张: 14

版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923-6

定 价: 78.00 元

---

文献分社出品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 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## 中国古籍十二讲

### 卷首的话

2015年，在第二十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，国家图书馆启动了“国图公开课”活动。公开课依托国家图书馆所藏海量资源，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提高公众文化生活品质为宗旨，开设一系列专题课程，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模式，供社会公众免费学习。时至今日，已推出《汉字与中华文化》、《论古琴的文化精神》、《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》、《昆曲》、《中国伟大发明》等一系列专题讲座。2016年，馆里安排我就古籍方面的内容开展专题讲座，作为国图公开课推出。我遂将以前的文章翻检出来，经过筛选，拎出十二个选题分专题进行讲座，名之曰“中国古籍十二讲”。

十二讲都讲什么？挺费踌躇。公开课不同于学校的专业课，专业课要有系统，要章节连贯，最终完成一门课程的教授。公开课是专题性讲座，这一讲和那一讲，彼此不相连贯，难以几讲只谈一个专题，而是每讲必须完成一个专题，这就很不好安排。好在要我讲的内容是中国古籍，因此凡涉古籍者都可以谈。既谈古籍，率先应当交代的恐怕应该是中国古籍的起源。中华民族有五千年文明，而且是连续不断的文明。究其原因，最根本的就是中国的书籍起源早。惟有有了书籍，知识才可以得到广泛传播，经验才得以有效介绍，思想才可以得到阐扬，主张才可以有效传扬，历史进程才得以总结，所以第一讲便设计了“中国书籍的起源及其装帧形制的演变”。此题本是《中国古代书籍史》研究阐释的内容，拿来作为中国古籍公开课的第一讲，可能是听众、读者容易接受的开篇。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》，全国古籍保护计划

实施已近十年。十年来，在全国古籍普查及珍贵古籍申报评审中，先后发现珍贵古籍三百多种，其中写、刻的佛经就有138种之多。这些新发现古籍都是什么，始终未能及时向全国各族人民进行报告。我作为其中的知情者，有义务借公开课之机，向听众作一汇报。但囿于讲座的时间限制，无法全面展开，故只能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种，分三次讲授。第二讲“宋刻《开宝藏》及辽刻小字《契丹藏》零种的新发现”、第三讲“宋刻标抹本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新发现”、第四讲“陈老莲《水浒叶子》初刻本的再发现”，就都属于这个范畴。

《文苑英华》是继《昭明文选》之后的总集名著。从北宋雍熙三年（986）修竣进呈，到最后由致仕宰相周必大于南宋嘉泰四年（1204）校刻版行，前后经过了二百多年。其间所经的曲折，有很多故事和经验教训，是历代官修大书所应汲取的，故将之列第五讲。

《锦绣万花谷》乃市井类书，2012年匡时春拍过云楼藏书中的代表性拍品，曾轰动京城，撬动全国，落槌时竟拍出两亿多，是近年来古籍拍卖最抢眼的一次。可是这部书的辑者到底为谁，卖家道不明，买家也说不清。为此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，继续考索，力争给世人一个较清晰的交代，借以满足知识界的渴望，也给寻常百姓讲个有趣的故事，故有了“《锦绣万花谷》编者为谁再探讨”一文发表。现在将之作为第六讲，进一步广泛征询学界的意见。

南宋唐仲友在台州任上贪赃枉法、裙带干政、骄奢淫逸、利用配犯伪刻楮币、开雕《荀子》等书私自发卖，尝被当时两浙东路茶盐司提举朱熹连章状告。近当代有人描述此事，多被说成唐仲友刻《荀子》而遭朱熹弹劾，给人的印象似是朱熹过于霸道，连刻一《荀子》都要遭到他的状告。真相到底如何，久想向世人说个明白，还历史一个真面目。此为将之作为古籍十二讲之一的内心考虑。

清代阮元作《十三经校勘记》并在南昌府学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自负手中握有十一种宋刻十行本《十三经注疏》。事实反复证明，他当年所说的十一种宋刻《十三经注疏》各书，绝大多数已不是宋刻本，而是元刻明修本，个别已是明翻本。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，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影响并滋养



中国几代学人，直到今天仍为学界所珍视。但也毋庸讳言，阮刻《十三经注疏》确实存在不少问题。今天在古籍普查与珍贵古籍申报评审中，不但有元刻明修十行本《十三经注疏》整部帙的残书发现，其零种更是屡见不鲜，因而给了我们重新梳理十行本《十三经注疏》的客观条件。第八讲《宋刻十行本〈十三经注疏〉》便缘此在公开课上得以安排。

元刻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，乃现存该书的最早刻本。《东京梦华录》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至宣和（1102—1125）间北宋都城汴梁（今开封）的情况。其于开封的城垣、河道、桥梁、宫室、官署、街巷、坊市、店铺、酒楼，以及朝仪郊祭、时令节日、民俗风情、饮食起居、歌舞百戏等无所不包，确可说是文字版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是研究北宋都市及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。如此一部重要而有趣的著述，其作者果真就叫孟元老吗？在不少学人心里始终是个结。既然是个结，历代都有人想解开它。从清人常茂徕、到民国年间邓之诚，到20世纪80年代孔宪易，一路考来，惟孔宪易先生考索的方向、路径对头，但也未能彻底到位。我是在孔先生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前探，故原文称为《东京梦华录作者续考》，纳入本讲座第九讲时，改题为《〈东京梦华录〉及其作者考》。

《千家诗》是旧时蒙童的重要读物，它与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一道，构成所谓“三百千千”的教科书体系。从明代宣德年间起，上至皇宫大内的内书堂，下至穷乡僻壤的私塾，近涉《红楼梦》里大观园的女眷，远到高丽、琉球等，都有《千家诗》在流传，可谓家弦户诵，尽人皆知。然而，如此脍炙人口的《千家诗》究竟出于谁手，来自何方；谁率先为之作注，并用以教授童蒙；谁为之步韵增和、图解诗意等诸多问题，从来人云亦云，未予深究。第十讲《明内府写本〈明解增和千家诗注〉》就试着想解开上述诸迷。

中国古籍已有几千年历史，中间虽有天灾、人祸、虫蛀、鼠啮等破坏，但至今存世者，仍是浩如烟海。其中历代皇家、各级官府的公藏能躲开各种灾难，迄今仍能流传于世者，屈指可数。绝大部分存世之书，特别是那些珍贵版本，还是私人藏书家递藏护持下来的。他们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。宋刻“两陶集”能传至今天，饱

含几代藏书家的心血，极具典型意义。故以“昔时陶陶室，今日在国图”为题，作为古籍十二讲中的第十一讲，借以揭示动人而有趣的珍藏故事，褒扬他们悉心搜求，精心爱护，最终化私为公的高尚品质。

我一生热衷的专业领域，是版本目录之学。其中的古书版本鉴定，是版本目录之学的核心内容。我讲公开课，没有一讲谈版本鉴定，可能会使一些人失望，所以第十二讲特意安排了《古书版本鉴定》。“鉴定”一词，概括的解释是“辨别并确定事物的真伪与优劣”。具体到古书，“鉴定”则主要是指对古书版本的“鉴别与考定”。它与书画鉴定家们所说的“虚鉴与实证”基本相同。“虚鉴”是指凭借眼力搜索所得之版式行款、字体刀法、印纸墨色、刊工、讳字等纸面上显现出来的风格特点与考据，先在内心做出的大致判断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过“观风望气”所得出来的判别。“实证”是指对书内、书外所捕捉到的可资考证的文献证据，如序、跋、凡例、书牌、刊记，乃至碑传、墓志等反映出来的证据加以有逻辑的考辨及所得出的结论。然后将“虚鉴”与“实证”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，最终就能得出可靠的鉴定意见。所以鉴定既是鉴定者由眼入神并进行初步判别的心路过程，也是鉴定者寻求考据并加以逻辑思维最后得出结论的考证过程。

这十二次讲座的前期准备，虽然有我发表过的文章作支撑，但要将之变成有文字有画面的图文并茂的讲义，还要花很大功夫，甚至是再创作。这项任务的完成，全赖我的学生、国家图书馆博士后芦婷婷助力。借此书出版之际，特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这十二讲集中安排在今年最热的时段，这次暴晒，下次暴雨，幸赖每次都有一批热心的听众捧场，算是圆满完成。这里顺便向发起这次讲座的馆领导及国家古籍保护中心，向承办这次讲座的社教部同事，向每次前来捧场助讲的听众，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就在讲座进行过程中，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夏艳博士来我这里办事，看到了我的讲座课程表，便热情洋溢地说：“这个讲座挺好，讲完之后若有意将文稿出版，本公司愿给予支持”。为此，课程讲完后，我又重新将讲义审读一遍。删繁补漏，



润饰文字，严密逻辑，连贯语气，使之更为顺畅。现在此稿要交付出版社了，我还有几句话想说：一是感谢国家图书馆，特别是古籍馆为讲座及本书提供馆藏古籍图片；二是本书个别图片如人物图像，来自网络，在此正式声明；三是书中引文、行文、表述、判断、结论，凡有不当之处，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正。

李致忠

2016年8月17日于北京



## 中国古籍十二讲

### 目次

- 001/第一讲 中国书籍的起源及其形制的演变
- 021/第二讲 宋刻《开宝藏》及辽刻小字《契丹藏》零种的新发现
- 033/第三讲 宋刻标抹本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新发现
- 045/第四讲 陈老莲《水浒叶子》初刻本的再发现
- 063/第五讲 太平兴国三大书之一《文苑英华》
- 087/第六讲 《锦绣万花谷》及其辑者考
- 099/第七讲 宋唐仲友刻《荀子》遭劾真相
- 115/第八讲 宋刻十行本《十三经注疏》
- 133/第九讲 《东京梦华录》及其作者考
- 143/第十讲 明内府写本《明解增和千家诗注》
- 159/第十一讲 昔时陶陶室 今日在国图
- 189/第十二讲 古书版本鉴定
- 203/后 记



## 中国古籍十二讲

### 第一讲 中国书籍的起源及其形制的演变

#### 一、中国书籍的起源

所谓书籍，最简明的诠释就是指典籍、载籍、经籍。在书史研究者看来，不是有文字者皆为书。他们认为正规书籍是指以传播知识、介绍经验、阐述思想、宣扬主张等为目的，经过编辑或创作，书写、刻、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。这是我们当代人给书籍下的定义。

《隋书·经籍志》总序从另一角度表述云：“夫经籍也者，机神之妙旨，圣哲之能事，所以经天地、纬阴阳、正纪纲、弘道德。”意谓，书籍乃人们透过智慧思维而反映出来的妙旨，是圣哲具备的特有能事，所以它有矫正纲纪，弘扬人类道德，保持社会发展稳定的功用。可知书籍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，它首先是人们智慧物化出来的结晶，并借助某种物质为载体显现出来，所以它既具有一般社会产品的物质形态，又具有一般物质产品不具备的意识形态，因此有人说书籍是物化了的思维，凝固了的意识，很有道理。

以上述正规书籍的概念，来衡量中国书籍的起源时代，我们既可以找到它产生的时代下限，也可以找到它产生的时代上限。

孔安国古文《尚书序》曰：“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”又说：“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《三坟》，言大道也；少昊、颛顼、高辛、唐、虞之书，谓之《五典》，言常道也。”孔安国生活于西汉时期，孔子十世孙。在说了上述这段话之后，也许怕时人会追问这些书怎么到现在一种也

不见流传，所以其在古文《尚书序》中继续补充说：“先君孔子生于周末，睹史籍之烦文，惧览之者不一，遂乃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明旧章；删《诗》为三百篇；约史记而修《春秋》；赞《易》道以黜《八索》；述《职方》以除《九丘》；讨论《坟》、《典》，断自唐、虞以下，讫于周。芟夷烦乱，剪裁浮辞，举其宏纲，撮其机要，足以垂世立教。”意谓三皇五帝时的那些书，经过孔子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明旧章；删《诗》为三百篇；简约旧史而修《春秋》；赞《易》道，而废黜《八索》；述《职方》，以废除《九丘》。同时“芟夷烦乱，剪裁浮辞，举其宏纲，撮其机要”，使之足以垂世立教。一句话，前边所说三皇五帝时的那些书，经过孔子的删润整理，成了后来所说的六艺。而这六艺，便成了孔子教授学生的课本，所以说“足以垂世立教”。

当然，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，孔安国为古文《尚书》作传，历来被说成是一种伪说，不足为凭。这样我们就要引述与孔安国同时代人司马迁的几段话，来进一步加以证实。司马迁《史记》卷四十七《孔子世家》曰：

孔子之时，周室微而《礼》、《乐》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缺。追迹三代之礼，序《书传》……故《书传》、《礼记》自孔氏。

古者《诗》三千余篇，及至孔子，去其重，取可施于礼义……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

孔子晚而喜《易》，序《彖》、《系》、《象》、《说卦》、《文言》。读《易》，韦编三绝。

子曰：“弗乎弗乎，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？”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。

这几段话与孔安国的上述说法大同而小异，表明《周易》早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了，

否则就谈不上他晚而喜《易》，且翻阅得遍数较多，致使《周易》的编简之绳都断了几次。又追记三代之礼，序《书传》，所以《书传》、《礼记》始自孔子。此前诗有三千多篇，经过孔子筛选，而成为《诗》三百篇。且根据各国记史之书，而修撰《春秋》。进一步证明，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以前，确已有了书，只不过经过孔子的“芟夷烦乱，剪裁浮辞”，最终形成了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、《乐》等六经，并用这些书来教授学生。



孔子

孔子名丘，字仲尼，鲁国曲阜（今山东曲阜）人。生于公元前 551 年，卒于公元前 479 年。上引既然说孔子“赞《易》道以黜《八索》；述《职方》以除《九丘》；讨论《坟》、《典》，断自唐、虞以下，讫于周”。说明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、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在孔子之前已经形成，并且久已流行。否则孔子依什么为底本进行删汰订定呢？由此，我们可以将中国正规书籍产生的时代下限定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之前，即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以前，中国书籍已经起源。

下面我们来谈中国书籍起源的时代上限。

《史记》卷二《夏本纪》记载：“帝启，禹之子。其母，塗山氏之女也。有扈氏不服，启伐之，大战于甘。将战，作《甘誓》。”宋陈经《尚书详解》卷七《甘誓》篇下小注曰：“夏书。”表明远在夏启之时已有了像《甘誓》这样的作品，虽然还只是一篇，但它是有目的和宗旨的论述，具备书的特质。

《汉书》卷二十三《刑法志》载：“夏有乱政，而作《禹刑》；商有乱政，而作《汤刑》；

周有乱政，而作《九刑》。”表明夏、商、周三代都已有了刑法。春秋后期，郑国子产铸《刑书》，晋国赵鞅铸《刑鼎》，昭示国人。东汉王充《论衡》卷十二《谢短篇》更说：“古礼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刑亦正刑三百，科条三千。出于礼，入于刑。礼之所去，刑之所取。”可知法律之文，夏、商、周都有。

《尚书·多士篇》曰：“成周既成，迁殷顽民，周公以王命诰……惟尔知，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，殷革夏命。”孔安国《尚书传》曰成周即“洛阳下都”，“殷大夫士，心不则德义之经，故徙近王都教诲之”。唐孔颖达《正义》曰：“顽民，谓殷之大夫士从武庚叛者，以其无知，谓之顽民。民性安土重迁，或有怨恨，周公以成王之命诰此众士，言其须迁之意。”南宋吕祖谦撰、其门人时澜增修之《增修东莱书说》卷二十四，解释曰：“以其父祖之旧闻而开谕之也。……尔先人典册所载殷革夏命之事，历然可考。我周之革商，正如是耳。”

这是在迁移殷之顽民，而顽民有怨愤牢骚，周公口衔王命，出来讲话的训辞。说的是：你们应该知道，你们的先人在革夏命之后，也将夏之顽民迁到了王都附近，这在你们先人的册书典籍中是有记载的。我们今天所为，乃是你们先人早已做过的事情，有什么怨气牢骚可发的！因此这里的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”，向被引来作为书籍起源的证据之一。

殷革夏命在公元前 17 世纪，孔子生活的时代在公元前 551 年至前 479 年的春秋末期。据此，我们把中国典籍起源并逐渐发展的时代锁定在距今 2500 至 4000 年前这段历史跨度内，应该是可信的。比起所谓 3000 年前两河流域楔形文字经典、5000 年前埃及象形文字《死灵书》，其内容要丰富得多、正规得多、深刻得多。比起 1200 年前希伯来文木板礼书，那就更要早得多、丰富得多。

人的思维表达通常是两种途径，一种是用语言传扬出去，一种是用文字表述出来。任何情况下，只要一动用文字，就有个附着材料问题。没有载体，文字永远无法显现。书籍，是人们逻辑思维的文字表述，没有行之有效的附着材料，或者说没有行之有效的文字载体，永远产生不了书籍。所以书籍能否产生，前提不仅要有文字，还要有相应的制作材料。

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以前所出现的这些书，是书写在什么载体，或者说是什么材料制作而成呢？比孔子生活的时代稍晚，战国初期的墨翟回答了这个问题。

《墨子》卷二《尚贤篇下》曰：

古者圣王既审尚贤，欲以为政，故书之竹帛，琢之槃盂，传以遗后世子孙。

《墨子》卷八《明鬼篇》曰：

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，其务鬼神厚矣。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，故书之竹帛，传遗后世子孙。咸恐其腐蠹绝灭，后世子孙不得而记，故琢之槃盂，镂之金石以重之。

“书之竹帛”固可“传遗后世子孙”，但又怕它们“腐蠹绝灭”，“后世子孙不得而记”，故又将之“琢之盘盂，镂之金石”，以求其永无腐烂、虫蛀绝灭之虞。而最能传递先王之道，令墨翟等后世子孙得而知之者，还是《墨子》下面这段话。

《墨子》卷四《兼爱篇下》曰：

何知先圣六王之亲行也？子墨子曰：“吾非与之并世同时，亲闻其声、见其色也，以其所书于竹帛，镂于金石，琢之盘盂，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。”

上述这些墨子的说法，并非有意为我们阐述书籍的制作材料。墨子只是站在其生活的时代，追述从前，描绘当时，告诉人们竹、帛、金、石等材料，是可以承载文字并传道授教的。墨子这种生动鲜明的描绘，可以说是对纸书出现以前书籍制作材料的高度概括。

东汉王充《论衡》卷十二《量知篇》也说：“夫竹生于山，木长于林，未知所入。

截竹为筒，破以为牒，加笔墨之迹，乃成文字。大者为经，小者为传记。断木为契，枿之为板，力加刮削，乃成奏牍。夫竹木，羸苴之物也，雕琢刻削，乃成为器用，况人含天地之性，最为贵者乎！”意思是说竹、木这类粗苴之物，不知要被用到哪里，但经过人们有目的的加工，就能变成书籍的制作材料，何况饱含天地灵性的人类，经过教育培养，多可成材。其实不仅文献中有这方面的大量记载，近年出土的大量简牍，更以实物证明了这一点。

竹简和缣帛承担书籍制作材料有两三千年，对传播中华文明，起过不可磨灭的功绩。但缣贵而简重，并不便于人。探索新的取代物，是我们先人曾经追求的目标，于是有了纸。

早在蔡伦改进造纸术之前，中国已经有了纸。无论文献记载，还是考古发现，都证明了这一点。只不过那时的纸质粗糙，尚不能用来写字。经不断发展，到纸用来制作书籍，应是汉代的事情。

唐马总《意林》卷四摘引东汉应劭《风俗通义》说：“光武车驾徙都洛阳，载素、简、纸经凡二千辆。”此话是说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之后，将都城从长安迁往洛阳，其中所搬运的经籍就装有两千车。而所载两千车的书籍中，有的用缣帛写成，称为“素”；有的用竹木写成，称为“简”。这里的“纸”指什么？如果真是纸，则至少说明在西汉后期，已经懂得用纸来写书。古人虽有将缣帛就说成纸的习惯，但这里的“素”，指的已经是缣帛，故与其相对应的“纸”，应当就是真正的纸。

东汉贾逵长于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汉章帝令他从学《公羊传》的学生中选出二十人，教以《左氏传》，并“与简、纸经、传各一通”（南朝宋·范晔：《后汉书》卷六十六《贾逵传》）。这里的纸经、纸传究竟是纸还是缣帛，历史上的大多数人都含混地称其为纸。

至汉和帝时，尚方令蔡伦则认识到“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，其用缣帛者谓之纸。缣贵而简重，并不便于人”，他“乃造意用树肤、麻头及敝布、鱼网以为纸，元兴元年奏上之。帝善其能，自是莫不从用焉，故天下咸称‘蔡侯纸’”（南朝宋·范晔：《后汉书》卷七十八《蔡伦传》）。蔡伦是第一位意识到几千年“书之竹帛”却“缣贵而简重”

的弊端，遂刻意造出“天下莫不从用”之好纸的人。这一革新创造使书籍制作材料发生革命性转折，为中华文明与人类进步做出不朽贡献。

北宋苏易简《文房四谱》卷四载：“崔瑗与葛元甫书：‘今送《许子》十卷，贫不及素，但以纸耳。’”崔瑗字子玉，主要活动于东汉章帝至顺帝时期。在其写给葛元甫信中提到：现在送给你的《许子》十卷，本应用缣帛来写，但因家贫，买不起丝织品，只好以纸写之。表明至崔瑗活动的那个时代，用纸写书已是较为普遍的事情。

晋代傅咸写过一篇《纸赋》，对纸大加赞美：“夫其为物，厥美可珍。廉方有则，体洁性真。含章蕴藻，实好斯文。取彼之弊，以为己新。揽之则舒，舍之则卷。可屈可伸，能幽能显。”表明这时纸的质量，已有大幅度提高，行用很长历史时期的简、帛，已处在被取代的前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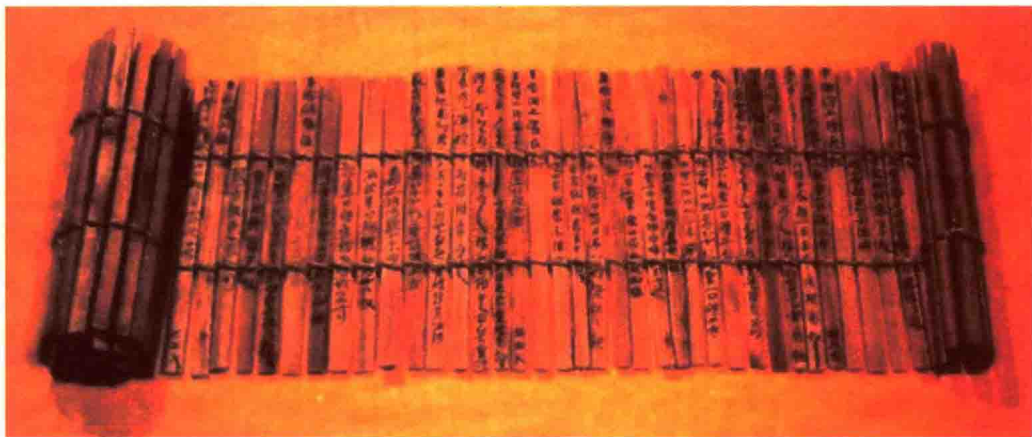
东晋末年，豪族桓玄（369—404）掌握朝中大权。据《初学记》卷十一所引《桓玄伪事》载，桓玄曾下令：“古无纸，故用简，非主于敬也。今诸用简者，皆以黄纸代之。”自此之后，纸完全取代简、帛，成为书籍唯一制作材料。

## 二、中国古籍装帧形制的演变

书籍的装帧形式，取决于书籍的制作材料、制作方法，以及是否便于翻检和装订牢固。适应书籍的制作材料、制作方法，采用相应的装帧形式并流行相当一段历史时期，形成约定俗成的装帧制度，这是书籍装帧形制演变的必然规律。

### （一）竹书简策装

所谓“简策”，就是编简成册。“策”是“册”的假借字。“册”是象形字，像是绳穿、绳编的竹木简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“册……象其札一长一短，中有二编之形。”《仪礼·聘礼》曰：“百名以上书于策，不及百名书于方。”《仪礼》卷二十四东汉郑玄注曰：



竹书简策装

“策，简也；方，板也。”唐贾公彦《仪礼疏》曰：“简谓据一片而言，策是编连之称，是以《左传》云‘南史氏执简以往’，是简者未编之称。此经云‘百名以上书之于策’，是其众简相连之名。”意思是说一根一根的竹片，就称为简，将众简编连起来，就称为策。所谓简策，实际就是编简成策。

古人编简成册有两种方式：一种是在竹木简上端钻孔而后以绳穿连。汉代刘熙《释名》卷六《释书契第十九》云：“札，栝也，编之如栝齿相比也。”意思是说在写好的竹木简上端钻孔，然后用绳依次穿连，其上边好像梳子背，下边诸简垂挂，如同梳子的栝齿相比。这是一种穿连的方法。另一种是用麻绳或丝线绳，像编竹帘子一样地编连竹木简。编绳需要几道，要看书籍所用竹木简的长短。短简两道编绳即可，长简也有用三道四道编绳的。甘肃出土的《永元器物簿》就是两道编绳。至于是先写后编，还是先编后写，两种情况都有。

## （二）帛书卷子装

帛指缣帛，是丝织品，用它来制作书籍至晚在墨翟生活的战国初期以前就出现了。否则《墨子》书中就不会反反复复地说“书之竹帛”。出土的帛书实物也